

浅析张惠言《词选序》“词近诗骚”的词学思想及其对词之尊体的推动

刘沁韬

(湖南大学文学院, 湖南省长沙市, 410000)

摘要: 清代常州词派开创者张惠言, 吸取前人推尊词体的经验, 扬弃将词与《诗》、骚相联系的理论成果, 形成自身“词近诗骚”的词学理论, 其主要词学思想集中体现在《词选序》中。他在理解把握《诗经》《离骚》相关的艺术特色的基础上, 借助诗骚已有的鉴赏分析资源, 观照词体本身, 加深对词体本身的特色认识的同时自然对词作为一种文学体裁的功能重新定位, 其词论为词的创作者和研究者划定了一个粗糙却又大体清晰的理论框架, 这一框架既符合儒家诗教, 又兼顾词本身艺术特色, 词得以开始步入比较健康的发展轨道, 最终对词体的推尊起到了较大的理论推动作用。尽管他未能条分缕析地言明他所体认的“词近诗骚”之观点, 而是凭借直觉感悟的方式, 对词这一文学体裁进行体认和辨析。

关键词: 张惠言; 词选序; 词近诗骚; 词学思想; 尊体

中图分类号: I209

文献标识码: A

以后人之眼综观词史, 在儒家诗教和词本身历史渊源的共同影响下, 词体卑下、“词为小道”的观念与尊崇诗文并赋予其“经国之大业, 不朽之盛事”^[1]的至高地位形成鲜明对比; 与之相应, 推尊词体不仅是词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在自身发展到一定成熟阶段的必然趋向, 也是词学对词体的探索和认识逐渐深入后革新观念的必然结果。清代常州词派开创者张惠言, 继承前人的理论成果, 将词与《诗》、骚相联系, 以“词近诗骚”的观点概括自身对词之功用和审美的认识, 在理解把握《诗经》《离骚》相关的艺术特色的基础上, 借助经学对诗骚的鉴赏分析资源观照词体本身, 加深对词体艺术特色认识的同时, 改变了词作为一种文学体裁的功能定位。也为今后词的创作者和研究者划定了一个粗糙却又大体清晰的理论框架, 这一框架既符合儒家诗教, 又兼顾词本身艺术特色, 词得以开始步入比较健康的发展轨道。也因此给后世提供了还可继续深入发挥的理论元素, 极大地推动了词学的发展。

一、张惠言之前的词学尊体史略述

以后人之眼观之, 词史上推尊词体的基本思路有二。其一, 区辨词体“本色”, 极力标举词的独特性, 尤其是其区别于以诗为主的其他文学体裁的特性, 逆势试图另辟与正统文学观念有异的道路。如北宋李清照, 强调词的合乐性质, 标举词“别是一家”; 明人尚“情”之说盛行, 因而强调词的抒情性并以此推尊词体。前者并无尊体意识, 只起到开辟思路的作用, 后者亦未能影响后世, 有效起到推尊词体的作用。因此可知, 在儒家诗教根深蒂固的时代, 与诗教正统相龃龉, 是达不到推尊词体之目的的。其二, 则是把词与《诗经》《离骚》为代表的诗骚一脉传统相系连, 标举词与诗骚同源, 有意借正统文学观念之势力抬高词之地位。这一思路在南宋即出现零星萌芽。明代, 理学和复古思潮与心学和主情思想同时盛行,

^[1]郭绍虞. 中国历代文论选 第1册[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02.

除强调词的抒情性外，也有继承宋人余绪把词体溯源至六朝乃至诗经的话语。^[2]清初至中叶之前，浙西词派主盟词坛，对明人词论多有针砭和扬弃，其词论中出现了越来越多追溯词至诗、骚的话语，认为词之源在诗经，甚至在《诗经》之前更古老的上古歌谣。但其切入点多从形式着眼：或着眼词外部的合乐形式，如王昶《国朝词综·自序》^[3]即认为词可追溯至诗是以词与诗“依永和声”之性质相同故，或着眼词的长短句形式，与上古歌谣及《诗经》及之后的汉代乐府之流部分句式长短不齐的篇章相似，如汪森《词综补遗后序》^[4]中即言：“自有诗而长短句即寓焉，《南凤》之操，《五子》之歌是已；周之《颂》三十一篇，长短句居十八；汉《郊祀歌》十九篇，长短句居其五；至《短箫饶歌》十八篇，篇皆长短句，谓非词之源乎？”虽有可取之处，但笼统地以外在形式之相似为依据，又无视词乐与古乐的区别，统归词于诗之流，客观而言，对词体的认识并不深入，故缺乏说服力。^[5]值得注意的是浙西词派代表人物朱彝尊亦论及词与诗骚的关系，且从表现内容和表现手法着眼的倾向已露端倪。其《陈纬云〈红盐词〉序》^[6]云：

词虽小技，昔之通儒钜公往往为之。盖有诗所难言者，委曲倚之于声，其辞愈微而其音益远。善言词者，假闺房儿女之言，通之于《离骚》变雅之义，此尤不得志于时者所宜寄情焉耳。

朱氏此段论词，并非有意为词张尊体之目，而是明确承认词为小道。但结合其自身学养和人生遭际，以及自身创作实践，朱彝尊对词的认识较一般的词论家更为深入，意识到了词与诗骚的相似性，更重要的是他借助联系这一相似性，认识到词自身的独特性，明确词、诗有别甚至意识到词、骚有别，不仅仅在于形式，更在于内容和表现手法等的差异。词诗有别，词宜言“诗所难言者”，且成功之作须借助委婉曲折的手法和隐微的语词（“委曲”、“辞愈微”，以“假闺房儿女之言，通之于《离骚》变雅之义”为“善言词者”）、结合相应的音乐（“倚之于声”），尤其是适合抒发寄寓个人的不得志之情（“此尤不得志于时者所宜寄情焉”）。可以说，朱氏的尊体目的并不明确，但其对词体更为深刻的认识毫无疑问推动了词论的发展，其后张惠言的词论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

二、张惠言词论内容的具体分析

张惠言的词论继承了朱彝尊的观点，但可看出具有明显的尊体目的。他的词学理论之精髓在于找准切入点，即词与诗、骚的相似点，充分利用诗骚资源观照并概括自身对词之功用和审美的认识，勾勒出一个比较粗疏却旗帜鲜明的词学理论框架。

张惠言在《词选序》最后点明其尊体之目的，是和其对前述词史问题的认识密切相关的。词为卑体的观念在词学发展史上已经年深日久，即使主张词应与“诗赋之流同类而讽诵”如

^[2]杨万里.略论词学尊体史[J].云梦学刊,1998(02):38-41.

^[3]（清）王昶辑.国朝词综[M].上海中华书局.

^[4]（清）朱彝尊，（清）汪森编.词综[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05.

^[5]朱惠国.中国近世词学思想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2003.

^[6]朱彝尊著.曝书亭集上[M].国学整理社,1937.05.487-488.

张惠言，也有其弟张琦于《重刻词选序》中言“先兄以为词虽小道”云云，虽不致表明张氏未脱离“词为小道”的传统观念，但也可反映出词为卑体的观念至张惠言身后数十年依然很难撼动。正因如此，张氏立足于词体本身，在把握诗骚共通之处的基础上，寻找词与诗骚的共同处，把握住“词近诗骚”这一体认，初步阐述词这一文类的审美特征，并以此为托庇，给予词符合儒家文学观念的诗教价值，词得以正名，真正“塞其下流，导其渊源”而“与诗赋之流同类而讽诵”，为常州词派词论的进一步昌明打下基础。

张惠言的词论，主要体现在其《词选》之序中，《词选》中入选的词作则是其理论主张利用前人词作为实例进行的具体批评实践。

张惠言在《词选序》^[7]开篇，首先也是从词的起源切入，为对词这一文学体裁进行总体定义作好铺垫：

词者盖出于唐之诗人，采《乐府》之音以制新律，因系其词，故曰词。

张惠言并未直接认定“词诗同源”的论断，而是肯定词是开创于唐代诗人之手的一种新的文学体裁，其特点之一是合乐，对此诸多词学家其实已有类似认识，无甚新意，在此则为铺垫，用以引出张氏自身对词体本质的理解，进一步对词这一文学体裁进行界定：

《传》曰：“意内而言外谓之词。”其缘情造端，兴于微言，以相感动，极命风谣里巷男女哀乐，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低徊要眇以喻其致。盖《诗》之比兴，变风之义，骚人之歌，则近之矣。

“意内言外谓之词”，代表着张惠言对词本质特征的认定，而与之相对应的是此段内容最后的“盖《诗》之比兴，变风之义，骚人之歌，则近之矣”。张惠言并未把词与“诗之比兴”“变风之义”“骚人之歌”等同，只言“近之”，可见张氏对词与诗、骚的相异之处是把握住了的；但在认可词独特微妙之处的同时，张惠言更是着眼于利用词与诗、骚的相近之处来对词的功用和审美进行把握和体认。中间部分即对词这一文学体裁进行了大致勾勒。词具有“缘情造端，兴于微言”的发生特点；表现手法是“极命风谣里巷男女哀乐”，表达目的是“道情”，表达内容乃是“情”，特指“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审美特色乃是“低回要眇以喻其致”。

在对词进行定义之后，张惠言递进一层，进而指出他对词的评价性看法：

然以其文小，其声哀，放者为之，或跌宕靡丽，杂以昌狂俳优，然要其至者，莫不惻隐盱愉，感物而发，触类条鬯，各有所归，非苟为雕琢曼辞而已。

张氏认为，词因其“文小”且“声哀”的形制特点和审美效果，造成了两种截然对立的结果：“放者为之”，则是“跌宕靡丽，杂以昌狂俳优”；“要其至者”，皆“惻隐盱愉，感物而发，触类条鬯，各有所归，非苟为雕琢曼辞”。中间的连词“然”，表明前后两种结果的对立，也表明了张惠言的褒贬态度：反对“放者”，欣赏“要其至者”。这一点在紧接着的后文中亦可直接证明，并分别举出后文的用语概括之，即“杂流”与“正声”。

^[7]唐圭璋编. 词话丛编 第1册[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5.10. 1617.

紧随其后，张氏在《词选序》中围绕自身观点对词的起源、发展、兴盛、衰落的演变过程作简要梳理，一方面从历史上词的各个时期分别举出实例，以佐证前述对词的看法，找出词体不尊的原因，一方面也从具体实例中进一步对自身的理论主张进行阐释说明，使之印象更为直观具体而易于仿效实行。

其后云：

自唐之词人，李白为首，其后韦应物、王建、韩翃、白居易、刘禹锡、皇甫松、司空图、韩偓，并有述造。而温庭筠最高，其言深美闳约。五代之际，孟氏、李氏，君臣为谑，竞作新调，词之杂流，由此起矣。至其工者，往往绝伦，亦如齐、梁五言，依托魏、晋，近古然也。

宋之词家，号为极盛。然张先、苏轼、秦观、周邦彦、辛弃疾、姜夔、王沂孙、张炎，渊渊乎文有其质焉。其荡而不反，傲而不理，枝而不物，柳永、黄庭坚、刘过、吴文英之伦，亦各引一端，以取重于当世。而前数子者，又不免有一时放浪通脱之言出于其间。后进弥以驰逐，不务原其指意，破析乖刺，坏乱而不可纪。故自宋之亡而正声绝，元之末而规矩隳。以至于今四百余年，作者十数，谅其所是，互有繁变，皆可谓安蔽乖方，迷不知门户者也。

今第录此篇，都为二卷。义有幽隐，并为指发。几以塞其下流，导其渊源，无使风雅之士愆于鄙俗之音，不敢与诗赋之流同类而风诵之也。

张氏既认为，词起源于“唐之诗人，采《乐府》之音以制新律”，则唐代词是为初始，此为初创期。自李白始，唐之词人“并有述造”，而温庭筠以其词“其言深美闳约”而成就最高。继而五代之际“孟氏、李氏，君臣为谑，竞作新调，词之杂流，由此起矣。至其工者，往往绝伦，亦如齐、梁五言，依托魏、晋，近古然也。”五代之际，西蜀、南唐君臣皆善为词，多为谑浪游戏之作，受此影响花间之词盛行，多艳俗脂粉气。在张氏看来，这一时期词作多可归入“新调”“杂流”之类，“词之杂流，由此起矣”，张氏言下之意，词沦落至后文所说“风雅之士愆于鄙俗之音，不敢与诗赋之流同类而风诵之”的境遇，即自五代不为正音而为艳科小技，“杂流”始肇其端。同时张氏亦肯定了五代词中亦有“工”而“绝伦”之作，“亦如齐梁五言”。齐梁诗被初唐首倡复古大旗的陈子昂目为“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8]，但另一方面，其中的精工之作如谢朓等的作品也是精彩绝伦，成为极有声价的发端，以至“调入初唐，时带六朝锦色”^[9]，对后世亦影响深远，连极力倡导复古的陈子昂也从中汲取创作养料。^[10]联系这一背景，可推知张氏并未对五代词一概抹杀，《词选》中选有南唐中后主、欧阳炯等的词作即为明证。但张惠言论述的重点在句末所下的结论，他把其所认为的五代词作精品之成功原因，归为“依托魏晋，近古然也”。魏晋之文学，后世标举其为“汉魏风骨”，认为它接续以《诗经》为代表的风雅正统，联系前述之分析，张惠言用这一类比，是有心围

[8] (唐)陈子昂著；彭庆生注释. 陈子昂诗注[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02. 218.

[9] 丁福保著. 历代诗话续编[M]. 北京：中华书局，1983.08. 1411.

[10] 魏耕原著. 谢朓诗论[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09.

绕其词通诗骚的意旨而言及的。言及宋词，张氏标举两宋词家，更进一步，特别点出“渊渊乎文有其质”，强调词不仅要有“文”，更应有“质”，这也和前语“依托魏晋，近古然也”相合。紧随其后，他又概括“荡而不反”“傲而不理”“枝而不物”三点，一方面作为对前所举张先、苏轼、秦观、周邦彦、辛弃疾、姜夔、王沂孙、张炎这几家词的肯定性总结，另一方面紧凑行文，以此评断宋代柳永、黄庭坚、刘过、吴文英四家词并不符合“文有其质”的标准，指出其都在文和质或其中某一方面因“各引一端”有失中正，但也因其词作“各引一端”而为当世所取重，致使后进者“不务原其旨意”只知“弥以驰逐”，因此拉开宋亡后词之“正声绝”，至元末“规矩隳”，至“当世安弊乖方，迷不知门户”之帷幕。而《词选》的目的，即要通过这一选本达到正本清源的疏通效果，正是“塞其下流，导其渊源”之谓。因故《词选》中四家词一律不入，而《序》中推举的词家则均在精挑细选之后得以录入。其中唐五代词，除去李白既是所标举的“并有述造”的词人之一，又是其中标举的首位词人，而选入词作一首之外，即以被盛赞“深美闳约”的温庭筠为首推。

三、张惠言词论体现的“词近诗骚”观点之分析

张惠言的词论所体现的，研究者早已从自身研究角度做出多种归纳总结，此不赘述。笔者认为，张惠言提出“词近诗骚”的理论主张的同时又有对词与诗之精妙差别之体认。其《词选序》利用词与诗、骚互相参照而展开论述，如前所述，其论述的路径乃是：先肯定词并非源于诗、骚，而是“出于唐之诗人”的一种新的文学体裁；再以“意内言外”对词进行总体界定。接下来的论述中，明显可看到儒家诗教统摄下《诗经》《离骚》的影子隐约现出：认为词具有“缘情造端，兴于微言”的发生特点；与之紧密相连，词的表现手法是“极命风谣里巷男女哀乐”，表达目的是“道情”，表达内容乃是“情”，特指“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审美特色乃是“低回要眇以喻其致”，并补充说明其形制特点是“文小”、审美效果是“声哀”。

首先看词的总体定义“意内言外”。其可考的出处众多，研究者对此多有论述；不能否认的是此处的“意”所指的基本内涵乃是后文的“情”，亦即“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而与之相近的是“诗之比兴”“变风之义”“骚人之歌”这三者，此处与词语义上是并列关系，确切来讲在张惠言看来它们指涉、重叠了相同的部分。词在此处是考察的对象，而诗、骚二者是参照物，因此关键处即是后三者的重叠部分。《诗经》不仅常以“风雅”代指，“风”“雅”亦常各自与《离骚》为代表的“骚”合称为“风骚”或“骚雅”，此间暗含《诗经》《离骚》之间的共通之处，刘勰《文心雕龙·辨骚》中曾引用刘安之语云：“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11]而细究《诗经》中的“国风”与“小雅”，以及“雅”的另一部分“大雅”可知，虽然不能说《离骚》源自《诗经》，但雅和骚有着明显直接的承传关系。这体现在无论是抒情的主体（君子贤人）、抒情基调（怨诽）、

[11]（南朝梁）刘勰著；范文澜注. 文心雕龙注[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45.

抒情主题（君臣之义、士之不遇等），还是比兴的基本思路（以嘉木、香草、花卉或金玉起兴，比喻或象征美人的姣好容貌或君子的品质高洁出众），二者都是前后相继。^[12]而“变风”与“变雅”时常同义连用，《诗大序》云：“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乃作矣。”孔颖达疏云：“变风、变雅，必王道衰乃作者。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治平累世，则美刺不兴……变风、变雅之作，皆王道始衰，政教初失，……恶则民恶，善则民喜，故各从其国，有美刺之变风也。”^[13]可见其美刺得失的政教功能。正因儒家文学观对文学的政教功能最为重视，词学观念受此浸染是自然而然，亦是大势所趋。张惠言借助诗、骚的相关资源，把词应符合的抽象理论原则做了大致的勾勒，而又不致令人把词与诗、骚混同。

再看词的发生特点和表现手法之要点，分别是“缘情造端”（且由后文可知，此“情”乃是“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兴于微言”，“极命风谣”、“男女哀乐”。与汉代奠定的儒家诗教观一同考察则知二者若合符契。《汉书·艺文志》云：

“《书》曰：‘诗言志，歌咏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14]

可见张氏之论与之相差无几，可以说基本上是把《汉书·艺文志》此段论述改换而成。

再看张氏论词之表达目的和与之相关的表达内容，乃是“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如前所述，亦与诗骚相近。所不同之处即是词所言的“情”与后文所言词的审美特色和审美效果高度一致，较之诗、骚，“低回要眇”的特色异常鲜明。“要眇”，语出《楚辞·远游》：“质销铄以约约兮，神要眇以淫放。”洪兴祖《楚辞补注》注云：“眇与妙同。要眇，精微貌。”^[15]结合后文补充的“其文小，其声哀”，词的抒情审美效果具体可感，跃然纸上。

在此基础上，他对词的功能进行重新定位，与之相应的是词这一文学体裁地位的自然提升，即“无使风雅之士怨于鄙俗之音，不敢与诗赋之流同类而风诵之”。

张惠言从词诞生的源头入手，将词比附于诗骚，在词与诗骚相通处对词之美感特质进行个人的体认和把握，指向词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类，既与诗骚相通，又侧重于自身的独特审美特征，从而突破了清代词论家力求推尊词体的局限，为之后常州词派的崛起和词之美学价值的深入探讨迈出了第一步。^[16]

四、结语

在前述分析中可以看出，张惠言未能逻辑清楚、条分缕析地言明他所体认的“词近诗骚”之观点，而是凭借直觉感悟的方式，对词这一文学体裁进行体认和辨析。这与中国古典文论

[12]葛晓音.屈赋比兴的性质及其作用的转化——兼论“雅”与“骚”的关系[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01):29-40.

[13]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10.

[14] (东汉)班固著;赵一生点校.汉书[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01.586.

[15] (宋)洪兴祖注;卞岐整理.楚辞补注[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01.147-148.

[16]迟宝东.试论张惠言的词学思想[J].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04):90-99.

偏重直觉感悟的特色是完全一致的,也正和清代楚辞研究者以“直觉”研究楚辞的直觉感悟之法大同小异。此种研究方法的最大特点在于与西方阐明理论之集中系统、逻辑森严截然不同,是散见于篇中各处乃至同类的各篇甚至同类的各书中,彼此发明、相互补充、互为照应,然而一旦串联起来,就可理出一条清晰的理论线索,构建于其上的则是一个完整成形的理论体系。^[17]以此观之,在考察包括词论在内的古代文论时,仅仅拘泥于字句考释,近于西方之条分缕析的形式逻辑之方法,而不够重视对之进行整体把握和具体的体认,难免会产生隔膜甚至误解。以此观之,恐怕这也是为何张惠言的词论在晚清之前追随支持者众多,晚清之后则批评讨伐者居多的原因之一,研究方法和角度不同,所见则不同矣。

参考文献

- [1] 郭绍虞. 中国历代文论选 第1册[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02.
- [2] 杨万里. 略论词学尊体史[J]. 云梦学刊, 1998(02):38-41. (清)王昶辑. 国朝词综 [M]. 上海中华书局,
- [3] (清)朱彝尊, (清)汪森编. 词综[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05.
- [4] 朱惠国. 中国近世词学思想研究[D]. 华东师范大学, 2003.
- [5] 朱彝尊著. 曝书亭集 上[M]. 国学整理社, 1937.05. 487-488.
- [6] 唐圭璋编. 词话丛编 第1册[M]. 北京:中华书局, 2005.10. 1617.
- [7] (唐)陈子昂著; 彭庆生注释. 陈子昂诗注[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1.02. 218.
- [8] 丁福保著. 历代诗话续编[M]. 北京:中华书局, 1983.08. 1411.
- [9] 魏耕原著. 谢朓诗论[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09.
- [10] (南朝梁)刘勰著; 范文澜注. 文心雕龙注[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6. 45.
- [11] 葛晓音. 屈赋比兴的性质及其作用的转化——兼论“雅”与“骚”的关系[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01):29-40.
- [12] (清)阮元校刻. 十三经注疏 [M]. 北京:中华书局, 1980.10.
- [13] (东汉)班固著; 赵一生点校. 汉书[M].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0.01. 586.
- [14] (宋)洪兴祖注; 卞岐整理. 楚辞补注[M]. 南京:凤凰出版社, 2007.01. 147-148.
- [15] 迟宝东. 试论张惠言的词学思想[J]. 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1(04):90-99.
- [16] 毛庆. 论清代楚辞研究中的“直觉感悟法”[J]. 文艺研究, 2007(04):70-77+175.

^[17]毛庆.论清代楚辞研究中的“直觉感悟法”[J].文艺研究,2007(04):70-77+175.

The Research on Chang-Hui-Yan's literature theory about Improving the status of Ci-poetry as the poetry in his preface of the book *Selection of Ci*

Liu Qintao

(College of Literature of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City, Hunan Province, 410000)

Abstract: Chang-Hui-Yan, the founder of Changzhou Ci school in Qing dynasty, drew on the predecessors' literature theory experience about improving the status of Ci-poetry as the poetry. His Major theory about Ci has concentrated expression in *selection of Ci*. In this book, in which he combined the similai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Ci and the two kinds of poetry ,the poetry in Book of Songs and Poetry of the South, than which he thinks the ci-poetry has almost the same features and function. His opinion deepening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later recognized poetry style. In the future, and has played an importantly promoting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Ci, relying on the way of intuition.

Keywords: Chang-Hui-Yan, preface of *Selection of Ci*, literature theory of Ci-poetry, Improve the status of Ci as poetry